

廢約與反霸

尹慶耀

——綜論中蘇共之關係

中共和蘇聯之間的「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早已是毫無意義的具文，但它的終止却引起不少人士的注意。人們打算從這件事上占卜一下那兩個共黨政權未來關係的走向。當然，任何占卜都不見得會是「靈驗的」。

如果以一九六八年八月的捷克事件爲分水嶺，把中共政權的對外政策分作兩個「歷史時期」①，那麼，前一個歷史時期，中共以反美的急先鋒自任，但却由「一邊倒」向蘇聯，逐漸走向「中間地帶論」的反美排蘇；後一個歷史時期，中共又以反蘇的急先鋒自任，由反美反蘇走向聯美反蘇。「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前一個歷史時期的產物，在第二個歷史時期它就理應終止。中共是利用中國對日抗戰的機會坐大的，戰後又藉蘇聯的背後支持②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攫取了中國大陸。但中共叛亂的步驟，並不完全符合史達林的意向，而它與美國的往來，又招致史達林的嫉忌③。就共黨政權本身言，美國是中共「本質上

註① 「歷史時期」是共黨術語。在同一歷史時期戰略不變、策略可變；在進入另一歷史時期後，戰略亦可改變。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事件後，阿爾巴尼亞議會正式決議退出華沙公約，毛、林、周於同年九月十七日致電阿共第一書記霍查、總理謝胡，支持其退約，聲言「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

註② 事後蘇聯透露，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蘇聯交給中共的日製武器，包括：七十多萬枝步槍，將近一萬四千挺機槍，四千二百多門大砲和迫擊砲，七百多輛坦克和八百個彈藥庫。使中共軍隊迫擊砲增加一倍，步槍和機槍增加兩倍，大砲增加三倍，彈藥增加十九倍以上，並首次獲得坦克、飛機和軍艦。見莫斯科（一九七一年八月廿六日）華語廣播「蘇軍粉碎日本侵略軍是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保障」。惟類似廣播會多次重複。

註③ 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稱：「那是一九四五年，史達林就是阻止中國革命，說不能打內戰，要與蔣介石合作，否則中華民族就要滅亡。當時，我們沒有執行，革命勝利了。革命勝利後，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以後，到莫斯科，簽訂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也是經過一場鬭爭的。他不願意簽，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最後簽了。史達林相信我們從什麼時候起呢？是從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中共輯印之「毛澤東思想萬歲」，四三二頁。按史達林非不支持中共叛亂，惟因恐引起美國干涉，而不願讓中共過早的全面叛亂。

「的敵人，而中國大陸的傳統文化以及其所引進的西方文化，都對馬列主義有所排拒。在此情勢下，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卅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宣佈向蘇聯「一邊倒」，宣稱「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復於同年八、九月間，連續發表五篇反美文章^④。他又在偽政權成立後，聚衆在美國大使館前無理喧鬧，且將美駐瀋陽總領事華德將軍(Angus I. Ward)扣押。凡此種種，無非是對美表示決絕，對蘇表示忠誠。中共當時極需蘇聯的明白支持，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就應運而生，雖然那是「鬭爭」得來的^⑤。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訪莫斯科，經兩月談判，「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始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由周恩來與蘇聯外長維辛斯基(Andrey Y. Vyshinskiy)簽字，自同年四月十一日起生效。

中共決定終止上項「同盟條約」後，蘇聯特別強調該約為中共安全的保障，並誇大在該約下蘇聯對中共援助的重大意義。然而，簽約當時中共雖獲得蘇聯三億美元的援助，那不僅抵不過蘇聯在我東北拆遷機器設備等掠奪所得，且在韓戰期間中共所消耗者恐尚不止此數^⑥。又爲了簽訂此約，史達林曾強迫中共接受和蘇聯創辦「民用航空」、「大連造船」及在新疆的「中蘇石油」、「中蘇金屬」等四個合營公司^⑦，對中國的重要資源從事掠奪^⑧，直到一九五四年黑魯曉夫、布加寧、米高揚等相偕訪平時，才於十月十二日簽署聲明，蘇聯將各該公司股權讓出，由中共逐年以物資抵價贖回^⑨。總之，在經濟方面，就簽約當時言，中共並非是受益者。至於蘇聯所謂對中共的安全保障，所列舉者爲在一九五〇——五三年的韓戰期間，和一九五八年所謂「臺灣危機」時，該項「同盟條約」爲防止帝國主義對中共的直接「侵略」起了決定性的作用^⑩。這項說法也頗有問題，因爲中共耗費人命與金錢參加韓戰，並非爲了大陸的安全。而中共砲擊金馬時，並沒有「帝國主義」要「侵略」中共，當時蘇聯的消極反應，倒成爲雙方關係冷淡的原因之一。

註④ 五篇文章是：「丟掉幻想，準備鬭爭」（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別了，司徒雷登」（同年八月十八日）；「爲什麼討論白皮書」（同月廿八日）；

「『友誼』，還是侵略」（同月卅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九月十六日）。均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註⑤ 見註④。

註⑥ 中共事後說：「至於蘇聯對中國的貸款，必須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國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這些軍事物資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於抗美援朝戰爭之中」。見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九日）給蘇共中央的信。

註⑦

註⑧

一、一九五六年三月中旬，黑魯曉夫前往華沙參加波共首領貝魯特(Pseudo Berut)的喪禮時，在短暫集會中透露：史達林對毛澤東提出一連串經濟要求，一片殖民主義味道。他堅持中國大陸工礦企業必由「中」蘇合營，他對「中國」內政有決定權。這些都使毛澤東十分難堪。二、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講話時稱：「一九五〇年，我和史達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於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要堅持，我接受」。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一六三——一六四頁。又「中蘇金屬公司」係開採新疆的有色及稀有金屬，主要爲鉻礦。

註⑨

在同一時期，蘇聯將其與東歐各國合營公司的股權，亦分別轉讓予各該國家，非獨對中共如此。本段文字中有關蘇聯方面論點，見蘇聯「和平與進步」電台（一九七九年四月六日）華語廣播。

註⑩

那麼，中共爲什麼要急於簽訂這項「同盟條約」？它對中共究竟有沒有什麼需要呢？有的。中共在美國姑息氣氛下攔得大陸，但它不能和美國作朋友；中共在史達林的不太信任下僥倖得逞，但它不能不依靠蘇聯。內部不穩、國際孤立，會使中共政權夭折。爲了對內鎮壓和向外推展世界革命，中共需要蘇聯的明白支持。一個爲期三十年的「同盟條約」，對於幼稚的中共政權，是一根强有力的支柱，而毛澤東就不惜出讓大量權益以得到它。

二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共有六條文字，其第一條是：「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爲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雙方並宣布願以忠誠的合作精神，參加所有以確保世界和平與安全爲目的之國際活動，並爲此目的之迅速實現充分貢獻其力量。」

日本帝國主義曾多次侵略中國，而蘇聯歷史上的傳統敵人有二，一是西方的德國，一是東方的日本。「九一八」事變後，蘇聯曾出賣中東鐵路給偽滿洲國，鼓勵了日本的侵略政策。在抗戰初期，蘇聯又協助中國對抗日本，以期削弱雙方實力。一九四一年三月蘇聯又與日本簽訂中立協定，以防其自身東西兩面受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史達林還在耽心日本和德國很快會「重新站起來」^⑩。但在一九五〇年時，日本少有再度侵略的可能，因而史達林並不急於簽約。另一方面，史達林不願見中共與美國有任何關係，但他自己却也不願與美國對立，因而「同盟條約」就有「與日本同盟」及「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爲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字樣。如果說這個條約的假想敵，明處是日本，暗中却有美國存在，實無不可。

這種說法並非虛構，香港「文匯報」也有相同看法，而且說得更爲露骨。它說：「（一九五〇年）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誕生幾個月，美國當局十分露骨地仇華、反華，公然叫嚷要把新中國扼殺於搖籃之中，像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之流，力圖復活日本軍國主義，要使日本成爲反華先鋒和遏制蘇聯的前哨。因此，中蘇盟約並不諱言，它的目的是防止日本或其他與日本勾結的國家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盟約還規定，締約國一方受到侵襲，另一方就提供軍事援助^⑪。」雖然當時美國未必如此反中共，而杜勒斯也到一九五三年才任國務卿，但它指出「同盟條約」是以美日爲對象，倒是不假的。受「侵襲」有沒有可能是一回事，而條

註⑩ 參閱一九五二年史達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六、關於資本主義國家間戰爭不可避免性的問題」，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二八一—三三頁。

註⑪ 香港「文匯報」（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社論「中蘇盟約理應了結」。

文中有締約國一方一旦受「侵襲」，另一方要提供軍事援助，就成爲有利於中共的軍事同盟了。

「同盟條約」第二條規定：「締約國雙方保證經過彼此同意與第二次世界戰爭時期其他同盟國於儘可能的短期內取得對日和約的締結」。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日本首相鳩山一郎在莫斯科與蘇聯發表復交的共同聲明，但由於「北方領土」等問題的阻梗，日蘇「和約」迄今仍未成立。另一方面，就在同一（一九五六）年更早些，中蘇兩個共黨政權却發生了齟齬。

中蘇共黨政權分裂的詳細經過，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但大致說來，一九六〇年二者已走向分裂。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一日「人民日報」以「全世界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力量聯合起來」爲題的社論，重提中間地帶論，指美國爲「帝國主義」，責「蘇聯領導人追求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夢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中，表示對外要與蘇聯「劃清界限」，拒絕「聯合行動」，且聲言「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是不打不倒的，現代修正主義也是不鬧不垮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至十二日，中共舉行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公報」中稱，中共要建立最廣泛的反美「國際統一戰線」，惟「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奉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當然不包括在這個統一戰線之內」。

由「一邊倒」向蘇聯即恃蘇反美，到自組反美統一戰線而拒蘇參加，確是很大的轉變。但如上所述，截至文革初期，中共只稱蘇共爲「修」，其公開的言論也止於反美排蘇。在此期間，「中蘇同盟條約」對中共而言，即使事實上並無功效，但表面的存在也仍然有益。

三

最大的轉變來自捷克事件。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一日清晨蘇軍入捷，廿三日「人民日報」斥蘇聯墮落成「社會帝國主義」。同年十月底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中，指「美帝國主義對越南進行的侵略戰爭，得到了蘇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蘇修叛徒集團公開出兵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國的默契和支持」；並號召「一切被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所壓迫的人民，應當結成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這時候中共的對外政策已進入一個歷史新時期，蘇聯不僅是「修」而且是「帝」了，中共的統一戰線，也不再是反美排蘇，而是反美反蘇了。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事件後，中共於四月一日起舉行「九大」，林彪在政治報告中，聲言中共準備跟蘇聯打正規戰乃至核大戰。據密西根大學教授曾任尼克森和季辛吉顧問的懷汀（Allen Whiting）透露，一九六九年當時，蘇聯確有粉碎中共核子能力的計劃，它在中國大陸周圍的陸軍全面動員，由一五個師增加到三〇個師，在外蒙建設了空軍基地，其核子飛彈也移至中國東北附近。後因美國反對，蘇聯的此項計劃未予實施^⑬。

註⑬ 「鄧小平的外交」(1)，日本「產經新聞」(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第三面。

捷克事件後，中共已開始向美國招手^⑭，嗣後美國又以右述情報為贊向中共搭橋，於是中共就因應國際情勢，與美蘇既展開談判亦對抗、又聯合又鬭爭的新關係，這也成為七〇年代的國際關係突出的特徵之一。

中共指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之後，就把蘇聯從社會主義陣營中排除。但中共的反蘇鬭爭，反而使其自身在共產集團內孤立。鄧小平乃於一九七四年四月在聯合國宣稱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並將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公諸於世，這又迫使中共唯一的盟友阿爾巴尼亞也開始叛離。

另一方面，從一九七一年起，蘇聯就以「和平友好合作條約」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展開擴張性的戰略部署^⑮，且逐漸對中共構成包圍形勢，使中共不能不加重視。它的「三個世界」理論，應是以第三世界為主力軍，聯合第二世界，反對第一世界中的兩霸，並區分主次，拉一（美）打一（蘇），且於一九七七年「十一大」文件中，將「蘇」置於「美」之上。一九七八年五屆「人大」之後，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高級頭目，不斷外出訪問，鼓吹以蘇聯為第一目標的「反霸統一戰線」。但在第三世界，中共可來，蘇聯可往，構不成對蘇的反包圍網。且因中共本身實力不濟，在對第三世界的爭奪中，蘇聯也漸佔上風。中共要在外交或心理上，對蘇聯構成反包圍的形勢，便不得不把統戰活動的重心移向第二世界中的日本與西歐，以及第一世界中的美國。

中共表示支持北約及歐洲共同市場，並與後者簽署貿易協定；中共容納了日本所提「第三國條約」^⑯，且以允諾對蘇「同盟條約」期滿後不再延長為條件，與日本簽署了「和約」；而與美國建交也係由中共主動促成。凡此，均足以顯示中共是以反蘇的姿態，誘致上述「三邊」（美、日、西歐）與它從事政治勾搭，同時又以「現代化」口號，誘致「三邊」的商人與它從事經濟往來，引進資金、技術設備乃至現代化武器，以增強它對抗蘇聯的實力。

尼克森時代的「三角」、「五極」之說，福特時代的新太平洋主義，卡特時代「三邊委員會」的政策構想，似乎都網羅了中共在內。這使得蘇聯極為敏感，指美、日、中共在搞三角軍事同盟，指中共已成爲北約第十六個會員國，並積極以行動反應。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蘇越間簽署軍事同盟性質的廿五年「友好合作條約」，以及十二月間越南進軍高棉，執行其「印支聯邦」的計劃，都可視為反應之一。

在右述情勢下，讓我們們返回來談一談「中（共）蘇同盟條約」第三條罷：「締約國雙方均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並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及任何行動或措施」。盡人皆知，中共和日本「和約」中附有反霸條款，那個「霸」就是蘇聯。蘇越條約中雖也有不以第三國為對象的條款，事實上它確是以中共（或許更有美、日）為對象的。那都是對「同盟條約」第三條的明白

註⑭ 參閱拙著「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六十二年六月）版，一四六頁。

註⑮ 參閱拙作「美國、中共建交與美蘇關係」，本刊第十八卷第五期，四六〇頁。

註⑯ 日本和中共「和約」中所稱「不影響締約國任何一方對第三國的關係」，乃日本所主張。

違反，該約不廢，將成爲中共、蘇聯的自我諷刺！

四

儘管我們在前節中分析了「廢約」的理由，但共黨行爲不一定會合乎傳統邏輯。儘管在去年八月簽署「和約」當時，鄧小平曾對日本記者透露，「同盟條約」期滿前一年，將由「新華社」聲明不予延長，但共黨並無遵守諾言的習慣。如果中共不通知對方終止，致讓該約自動延長五年（該約第六條規定期滿前一年未有異議即自動延長五年），它也會找理由解釋。這是說，中共之所以決定「廢約」，仍有其本身的企圖。

簡單說來，中共「廢約」至少可有三方面的意義。其一是它仍將以「反霸」爲當前國際統戰活動的核心，因此不便與此「霸」仍保持「同盟條約」的關係；其二是藉此向西方尤其美日表示「誠意」，希望對方也「誠意」地予以支持；其三是向蘇聯作態，希望半脅半誘地迫蘇聯和他有限度地緩和緊張關係。前二者姑置不論，第三方面則可對照事實加以分析。

中共頭目不止一人也不止一次聲稱「同盟條約」名存實亡，事實上中蘇兩個政權也曾兵戎相見，但該約不曾廢止。正確地說，現今中共所採的步驟也不是廢約，而是依照條約規定於期滿前一年通知對方不予延長。中共不在與蘇聯武裝衝突的高潮期「廢約」，而在急於與日本簽訂「和約」並與美國建交後「不予延長」，大有挾美日以恫嚇蘇聯的意圖在。然而，中共也並不想激怒蘇聯，使雙方的關係進一步緊張或惡化。

儘管中共進軍越南時，北平和莫斯科互相叫罵且備戰作態，可是雙方的邊界河流航行談判却在廣續進行。三月廿七日傳出的消息說，雙方曾獲致若干協議且交換了備忘錄^①。同月卅一日，黃華曾與蘇聯駐平大使伊·謝·謝爾巴科夫 (I. S. Shcherbakov) 在中共的「外交部」密談，黃華把廢約的意向通知對方（據稱曾提及對日「和約」），同時建議雙方舉行外長級以上的會議以改善雙方關係。謝爾巴科夫則提議雙方另訂互不侵犯條約，以代替原來的「同盟條約」。四月二日黃華才向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提出廢約建議，於三日通過後當天就通知了謝爾巴科夫。中共提出的廢約理由是：「鑒於國際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由於並非中國方面的原因遭到踐踏而早已名存實亡」。但同時又聲稱：「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中蘇之間的原則分歧，不應妨礙兩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爲此，中國政府建議，中蘇雙方對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改善兩國關係舉行談判」^②。

註①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三月廿八日)第四面。
註②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第一版。

事先打招呼是避免對蘇聯的刺激過於突然，廢約又敞開談判之門，是留個轉圜餘地避免關係惡化，說不定這一項姿態還可反過來向美日進行要挾。

至於蘇聯如何呢？第一，它不採主動，要中共負「廢約」責任。早在中共「人代常委會」決議「廢約」之前，中共頭目已屢言「同盟條約」名存實亡，但蘇聯也屢次聲稱該約繼續有效。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布里茲涅夫對美國「時代」雜誌表明：「（共）蘇條約是兩國人民友好的體現，蘇聯無意予以廢除」。又說，「中共領導視此約為廢紙，挑逗我們予以廢棄，我們不接受這樣的挑逗」。他進一步聲言，如果中共宣布廢約，則「此後的事態發展，其一切責任應由廢約一方承擔」。中共通知廢約後，莫斯科廣播於四月五日指此為一種「敵對舉動」，這與北平領導者在「政治方針的退化變節有關」。六日廣播除強調蘇聯會忠實履行條約義務協助中共外，且聲明不延長條約的全部責任應由中共承擔，「當然蘇聯將從中國方面的行動中作出相應的結論」。

第二，是藉「廢約」事件進一步孤立中共。蘇聯抨擊中共廢約違背了「中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聲稱蘇聯一直非常尊敬中國人民，尊重他們的歷史和文化，沒有客觀原因使中蘇兩個人民疏遠甚至對峙。這是企圖在中國大陸內部孤立中共政權；蘇聯指中共廢約，係因該約不符合中共大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意圖，妨礙它企圖統治世界的一切活動。這是在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中孤立中共；蘇聯更反覆指控中共與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結成罪惡的聯盟，一起反對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對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發動無恥的侵略，以世界帝國主義的直接幫兇和奴僕的姿態行事¹⁹，並轉載轉播外蒙（曾發表正式聲明）、捷克、日共、美共等抨擊中共廢約的言論，藉圖在共黨世界內進一步孤立中共。

第三，突破中共的「反包圍」企圖。中共廢約，中蘇共關係進一步惡化，符合西方的意願；蘇聯的謹慎反應，顯示其不願墜入圈套（在某種程度上，中共亦復如是）。蘇聯的主要企圖與行動，在設法破壞或抵消中共和美國、日本的「三角同盟」態勢，以突破中共對它的反包圍網。前述謝爾巴科夫建議北平與莫斯科另訂互不侵犯條約，即是此種企圖的表現。依據蘇聯的說法，一九七一年它曾向中共建議雙方締結不使用武力的條約，一九七三年又建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但均遭中共拒絕。又一九七八年二月中共五屆「人大」舉行前，蘇聯最高蘇維埃曾致電中共人代常委會，建議為促使雙方關係正常化，作成並發表相互關係基本原則的共同聲明而進行新的會談，蘇聯且為此準備了有關文件。今年四月十七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將一份照會交給中共「大使」王幼平，重申前述種種建議，且稱如果中共對上述蘇聯文件表示明確態度，則雙方會談的條件、地點等都可以商議²⁰。這表示蘇聯連拒絕會談的責任都不願負，而其目的仍在沖淡或抵銷中共與西方的關係。

第四，蘇聯的作風，是表面緩和實際強硬，不重在言詞上的抨擊而重在行動的反應。從中共進攻越南到現在，蘇聯在中蘇邊

註¹⁹ 莫斯科電台評論「罪惡的聯盟」（一九七九年四月九日）。

註²⁰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八日）夕刊第二面。

境駐軍已達四四師、六五萬人，附有三個彈頭的SS二〇中程飛彈已配置在中蘇邊境附近。蘇聯太平洋艦隊現有艦艇七五五艘（約一三三萬噸），其明斯克號潛艇（四萬三、〇〇〇噸）將調遠東，伊凡洛哥夫型水陸兩用強襲運輸艦亦將配置於太平洋艦隊。據日本「讀賣新聞」報導，蘇聯在遠東地區配置逆火式轟炸機一個飛行隊（共九架），如從伯力起飛，即使不在空中加油，也可把阿拉斯加、夏威夷和菲律賓列入其行動範圍內；如果空中加油，則可直飛美國本土西海岸。據最近獲悉，該項逆火式機配備地點為海參崴以北的青年城。又在中越共戰爭期間，蘇聯海軍游弋於中國的東海與南海海面，載有導彈的軍艦多次駛入越南金蘭灣、峴港、海防^②。今年五月十四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費留賓在日證實蘇聯海軍使用金蘭灣，為「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的義務^②。這些軍事行動，都是中共可以「理解」的實際反應。

五

「中（共）蘇條約」明年四月失效後，這兩個共黨政權的關係將會如何呢？

首先我們得確認，共黨間的相互關係，決不能以「和」「戰」那樣簡單的二分法來衡斷。葛羅米柯向王幼平提出的內容有所謂「普遍消除中（共）蘇緊張關係，並消除兩國關係正常發展的障礙」等詞句的照會後沒有幾天，布里茲涅夫在莫斯科聲言，蘇聯決心面對萬一同中共發生的任何對抗，並抨擊中共侵略越南，中共指此為玩弄詭計^③。然而，中共却仍然願與蘇聯談判。黃華於五月五日將一項備忘錄回交蘇聯大使謝爾巴科夫，表示願意談判的意向。同一天，鄧小平在接受日本「時事新聞社」社長大畑忠義訪問時說，中共和蘇聯將舉行談判，以謀求改善雙方之間的緊張關係。他表示，「除非蘇聯放棄其霸權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否則彼此關係不會有重大的改善。但他又說，「我不認為他們（蘇聯）將放棄霸權主義和擴張主義」。就在這次談話中，他聲稱：「中共保留對越南給予另一次教訓的權利，但中共將不會立即採取任何行動」^④。中共指稱，蘇聯的談判建議，恰巧在中（共）越進行談判的前後，與越南調兵遣將，積極備戰的策略相呼應、相配合。它說，蘇聯一邊發出談判建議，一邊空運大批軍火物資到越南，並以金蘭灣為基地，以砲艦為越南撐腰，為「東方的古巴」極盡打氣策動之能事，於是越南一開始就拒絕考慮中共八項「合情合理的」建議，把戰爭叫囂推到一個新高度。因此，中共指蘇聯是以談判掩飾備戰，毫無談判的誠意^⑤。至於中共自

註① 參閱：一、「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四月廿二日）第二面；二、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九年四月廿日）社論「蘇聯在東方的擴軍」。

註② 一、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六日）第一面；二、「日本經濟新聞」（同月十六日）夕刊第六面曼谷消息界（十五日）透露，去年十一月「蘇越條約」簽訂時雙方會交換有軍事合作性質的附屬文件，蘇聯根據此等文件，得以使用越南海港。

註③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社論「蘇聯建議談判的背後」。

註④ 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七日）第一版。

註⑤ 香港「文匯報」社論「蘇聯建議談判的背後」。

己呢？鄧小平對由馬蒂將軍率領的一〇五人法國軍事代表團的談話是，原則上，中共並不反對與蘇聯磋商，但是過去十年來，雙方邊界談判從無結果。他似乎在暗示，中共對與蘇聯進行會談將產生任何結果一事，並未抱認真的希望²⁶。如果說，雙方都不抱誠意，却都願從事馬拉松式談判，在會議桌上展開戰爭，似乎是合理的推測。

在右述五月五日鄧小平對法國代表團談話時，他仍在強調中共的主要威脅係來自蘇聯。中共指摘蘇聯長期以來，就曾在中國邊境省份製造過暴亂；一再入侵以挑起武裝衝突；策劃陰謀增強對中國的顛覆活動；派兵進駐蒙古；在沿中國邊境陳兵百萬，最近在遠東的兵力更有增加。這一系列的行動，雖然對中國（共）構成威脅的形勢，對抗的事實早已存在，霸權主義的野心早已暴露無遺。又說，葛羅米柯和布里茲涅夫言論的自相矛盾，反映出霸權主義者的擴張野心不死，正企圖作新的冒險嘗試，在打着「南擊北進」的如意算盤。中共聲言，「中國人民絕不懼怕任何恫嚇和威脅」²⁷。那麼，中共準備一戰嗎？

我們不同意懷汀教授的說法，他認為進入七〇年代，由於中共核武器的發展，使蘇聯永遠失去進攻中共的機會²⁸。如果蘇聯爲了懼怕報復而不敢向擁有幼稚的核武裝的毗鄰——中共進攻，那麼它又怎敢向擁有龐大的核武器而又遠隔重洋的美國進攻？果如此，則美國增加國防經費乃至與蘇聯進行限武談判，也就近乎多餘了。事實上，中共和蘇聯間的戰爭危機，是無法完全抹殺的。不過，依共黨的慣性言，軍事爭鬥乃屬最後手段，除迫不得已或確有一擊必勝的把握外，它們寧肯從事政治或外交鬭爭，而不訴諸武力。中共固無力向蘇聯挑戰，而蘇聯爲其全球戰略考慮，最佳利益是部署對中共的包圍形勢，支持越南等等進行代理戰爭。至於它和中共之間，除地區性小衝突外，它不會長期與中共纏鬥，使西方坐收漁人之利。就是中共也只藉抗蘇姿態，博取西方的同情與援助，它又豈肯甘心爲西方作馬前卒？只是，中共挑起對越戰爭，已使其對蘇鬭爭愈益複雜也愈形不利。

然則，中共和蘇聯會趨於和解嗎？五月廿四日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在刊登於英文「讀賣新聞」的一篇訪問談話中指出，中共和蘇聯是爲了各自的理由而僵持，一旦它們解決了爭議的話，也會爲了各自的理由而和解。他是在剛剛訪問過中國大陸之後，才發表上述談話，他預見這種和解並不太可能，倒不是因爲「我們在加以攔阻，而是因爲雙方各有其目的」²⁹。在此處，我們似乎可引證兩位蘇聯人的見解作參考。一位是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蘇共中委、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伊諾則姆采夫，另一位是「消息報」政治評論員，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阿歷山大。波文。他們是出席今年五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日本伊豆、下田召開的討論關於亞洲安全問題的第五次日蘇專家會議時，在日本分別發表談話。伊諾則姆采夫說，蘇聯

註²⁶ 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年五月六日）第五版。

註²⁷ 「蘇聯建議談判的背後」。

註²⁸ 「鄧小平的外交」。

註²⁹ 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年五月廿六日）第一版。

和中共並不關閉改善關係之門。蘇聯提出過種種建議，實際上能否改善關係，要看中共領導的態度而定。但中共向世界宣布其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觀點，呼籲以實力與蘇鬭爭，對蘇聯提出不合法且無根據的領土要求，在此現狀下，國家關係的正常化是難以實現的^⑳。波文則對中共的反蘇主義加以抨擊，但他認為中共的政治作風是獨特的，令人難以預測，中共實際上是否廢棄了「中（共）蘇條約」，是難以絕對確信的，今後應用心加以考慮。他指出，從最近數月的動態觀察，拉奏第一把提琴的是鄧小平及其側近，這是蘇聯中共問題專家們的意見。然而，鄧小平有沒有能力照自己的意思轉變中（共）蘇關係，他表示難以判斷，因為鄧小平也受到種種束縛，期待他根本轉變中（共）蘇關係是不合理的。他曾大膽地判斷，中（共）蘇關係正常化最早也得到一九八〇年代後半開始。那時候中共領導者為誰雖不得而知，但隨着客觀形勢的發展，中共領導階層會體到與強大的鄰國蘇聯關係正常化，才符合「中國民族」的真正利益。反之，漫長的國界線上存在着強大的敵人，是與中共的「國家利益」相反的。可是，中共對此徹底瞭解，還需要一段時間，因此他判斷那得到八〇年代後半。當然，他在談話中不曾忘記警告中共，談判不可附帶任何條件（如蘇聯從蒙古撤軍等），否則交涉就不可能^㉑。綜觀蘇聯方面的態度，它似乎仍將以代理戰爭、包圍形勢等，期待中共在實力壓迫下屈服，而不急於改變現行關係。

就中共言，它雖已聲言不求收回自一八五〇年代以來，俄國根據歷次不平等條約割佔的一五〇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㉒，就是俄國違約多佔的三三、五〇〇平方公里土地，也可商量作必要的調整^㉓，但它不會輕易完全放棄後者即所謂「爭議地區」，以便利用它作為對蘇鬭爭的藉口之一。而蘇聯即指此為非法和毫無根據的領土要求，堅持不讓。邊界問題不解決，所謂不使用武力和互不侵犯條約等等，也就無從談起。再則，中共報紙聲言蘇聯如果真要談判，就要表現真正的誠意，而真正的誠意，就在於蘇聯必須撤退在中國邊境的軍隊，不再以武力相威脅。「中國（共）對中蘇關係問題，已採取了嚴肅、負責的態度，既不糾纏於歷史舊賬，更展望着未來，在堅持原則分歧不應影響兩國正常關係的主張之下，是準備與蘇聯展開實質性的談判的」；並且警告布里茲涅夫「不要有眼不識泰山，不要妄下『決心』以招致嚴重的後果，幹不利於中蘇兩國人民的事」^㉔。這些代表中共主張的言論，透露了中共對蘇聯的軍事壓力是如何的意慮畏懼，它不斷要求先脫離軍事接觸，再談判改善關係，以拔除其鯁骨與芒刺。但這又被蘇聯認為附有條件，使交涉困難。季辛吉認為中（共）蘇和解在最近不太可能。我們認為它們的談判會陷於馬拉松式

註⑳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第五面。

註㉑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第五面。

註㉒ 「打倒新沙皇」，中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社論。

註㉓ 中共「外交部」文件「駁蘇聯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聲明」。見「新華社」（同年十月八日）北平電。

註㉔ 「蘇聯建議談判的背後」。

，甚至是戰爭的另一形態，其原因在此。

在本文前半，我們指出中共「廢約」有三種意義。換一種方式說，中共在玩西方牌，也在玩蘇聯牌。不過，它沒有和蘇聯攤牌的力量和膽量，它只能祈求在較好的條件下與蘇聯緩和緊張關係。西方牌的運用也有其限度，在進攻越南問題上，日本拒絕和中共共同行動，美國對亞洲共黨的衝突採取隔離政策，這些並不能令中共滿意。目前，日本在尋求與蘇聯改善關係。美國與蘇聯達成第二段限武協議，六月間在維也納簽署此項條約時，卡特與布里茲涅夫將舉行高層會議。蘇聯也對美國表現了一些「緩和」姿態。四月間邀季斯卡總統訪蘇，自然也含有同樣意義。在此情勢下，中共能否繼續獲取西方援助，俾能向蘇聯討個較好的價錢，實屬疑問。然而，即使此項願望難以實現，它也不會唐突地與蘇聯惡化其關係，自速其滅亡。波文之所謂八〇年代後半改善關係的預測，或非全無根據。

事實告訴我們，自從西方策定聯中共制蘇聯的計劃以來，蘇聯的軍事力量在加強，對西方的威脅在增高，向第三世界的擴張更加擴大。中共在越南的一次行動，一則顯示它仍然冒失、不够老到；二則暴露了它無力進行現代化的機動性戰爭，也不能擔當牽制蘇聯的角色；三則把蘇聯的機艦誘引南下，得以使用包括金蘭灣的越南基地，使得亞洲軍事失去均衡，美國和日本同感焦慮。今後，這個「聯」「制」政策，恐將要受到檢討了。

在前引季辛吉的談話中，他承認美國費了將近七年的時間，才瞭解莫斯科——北平爭議的底細。他說：「記得一九六九年我就任時，我們已體認到中共與蘇聯之間有爭議存在，但是最初我們並不知道其性質，而還認為它們會在世界的許多地區合作」。而今他認識到，莫斯科和北平是因為它們自己的共產理論而發生爭執，並非爲了日本和美國。因此他指出，工業民主國家最明智的政策，是勿企圖使中共和蘇聯互相對抗以坐收漁利。這位前國務卿又說：「美國並無與中共協調一致的政策」^⑤。

季辛吉是利用中（共）蘇衝突「聯」「制」一，在權力均衡狀態下架構世界和平政策的原始設計人之一，他最近的體認與觀點，對於這整個政策的重估，應該是有幫助的。

註⑤ 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年五月廿六日）第一版。